



# 吉金类系——海外博物馆藏中国古代青铜器(二):神面纹青铜器

张昌平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我们先从最早收藏神面纹青铜器的美国纳尔逊-阿特金(Nelson-Atkins)艺术博物馆说起。

纳尔逊-阿特金艺术博物馆位于密苏里河之滨的堪萨斯市,该市在行政上被东西划分归属于密苏里州和堪萨斯州,故有堪萨斯的堪萨斯(Kansas City, Kansas)和密苏里的堪萨斯(Kansas City, Missouri)之说。堪萨斯人常常对来访者介绍这一点,但对于没有这个背景知识的人而言,听到这样的地理称谓实在是很纠结。堪萨斯州和密苏里州都在美国中部的大草原上,是美国的大粮仓。堪萨斯州有向日葵州之称,密苏里州则是我们熟知的马克·吐温和埃德加·斯诺的故乡,以后者命名的斯诺基金会至今仍然致力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交流与研究。美国中西部经济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得到迅速发展,堪萨斯市的名小吃烧烤(Barbecue)可谓是这一发展的见证物。成为工业和商业中心的堪萨斯市,聚集财富、收藏艺术品、建立艺术馆,像美国其他大中城市一样,堪萨斯也走上这样一条博

物馆之路,这也就有了纳尔逊-阿特金艺术博物馆(图一)。

纳尔逊-阿特金艺术博物馆开馆于1933年,其时美国尚处于大萧条时期。在今天该博物馆的网站主页上,还在回顾当年开馆后的苦日子:博物馆整栋建筑内只有3部电话,观众离开后会关掉展厅的灯光——我们一些博物馆今天还在做的事情。这样的经历被作为“艰苦奋斗”的典型追忆,可能是我们不能理解的。不过要知道,美国的许多公共建筑特别是博物馆是每天二十四小时既开着灯光,也开着空调的。长年开着空调会让博物馆库房和展厅文物处于恒温恒湿的状态,当然大大有利于文物的保护。恒定不变的舒适环境也是访问者和工作者所追求的,营造这样的环境似乎是西方发达国家共有的观念,只是这个观念需要强大的经济能力和管理方式的支持。

纳尔逊-阿特金艺术博物馆是一个国际性的大博物馆,其藏品达3.35万件,涵盖从新石器到当代、从非洲到欧洲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艺术品。博物馆的亚洲收藏特别是中国收藏特强,中国文物的

数量达到7500多件,这一收藏大约在全美前五、海外前十名之前这样一个排名位置。中国文物中最著名者,大概要算来自山西洪洞广胜下寺的元代壁画《炽盛光佛经变》,该画画幅宽度超过15米,给参观者极大的视觉冲击和震撼。为博物馆购建中国文物收藏体系的是西克曼(Laurence Sickman),他自高中时起就对中国文化感兴趣,1930年哈佛大学毕业后获得哈



图一 纳尔逊-阿特金艺术博物馆南侧

二十一世纪翻新之前的纳尔逊-阿特金艺术博物馆:新古典主义的主体建筑和南草坪上的巨型羽毛球雕塑,分别代表了美国博物馆在二十世纪首尾两个阶段的建筑艺术取向。

佛燕京基金的资助,到中国为纳尔逊-阿特金艺术博物馆收购中国艺术品。西克曼汉语流利,对中国艺术和建筑都有研究,这对他在北京的收购帮助极大。回国后西克曼担任博物馆东方部主任,二战期间从军,但仍然在麦克阿瑟麾下的美军司令部从

二行 12 字:“陳伯鬯作宝尊彝,用贝十朋又四朋”,据铭文,此器可名为“陳伯鬯簋”。簋双兽首耳,器耳、颈部、圈足都饰浮雕或半浮雕的龙或兽,装饰十分豪华。引人注目的而又十分特殊的是,在簋腹部

前后两面和方座四角的主纹饰区,各自装饰有结构类似兽面纹、面部和眼睛像人的纹饰。西克曼致信当时正在美国访问中国青铜器的陈梦家。来国龙在分析中国和西方学者对青铜器不同的意趣时,讲述了这两人对该簋的讨论故事。陈梦家回信说:“单就铭文本身而言,我相信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年代可以订在西周早期。……我必须承认我从未见过与此相类的纹饰,眼睛是人的,而不是饕餮的,但双角又是饕餮的。从纹饰

和布局的设计来说,我不认为这是一件真品。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感觉。我希望我是错的”。西克曼也很快回复道:“我可能过于愚钝,但我觉得这次收购是可以接受的。我已经尽我所能仔细研究过它,我们的技术专家也仔细地检验了簋的锈蚀特征和铜质



图二 纳尔逊-阿特金艺术博物馆藏陳伯鬯簋 (引自 Nelson-Atkin Museum 1959)

陳伯鬯簋通高 33 厘米,全器由簋身和方座组成。簋身为腹壁较直的长方形、带珥的兽形耳向上伸出夸张的兽角、纹饰中轴区自獠首向下迤邐出勾云状扉棱、圈足半浮雕出双身共首的龙纹,这些既是颇为常见的西周早期方座簋形制特征,又反映出西周早期一种追求浮雕效果的装饰倾向。

簋的双耳为分铸铸接,外底下悬一铜铃——容器下悬铃也需要数次铸接。这样的工艺特征,是现代伪作青铜器以失蜡法为成形手段所不能够模仿的。此器不伪的特征,非常明确。

事东方艺术品情报工作,1953~1977 年间任纳尔逊-阿特金艺术博物馆馆长。西克曼是对纳尔逊-阿特金艺术博物馆发展特别是亚洲艺术品收藏贡献巨大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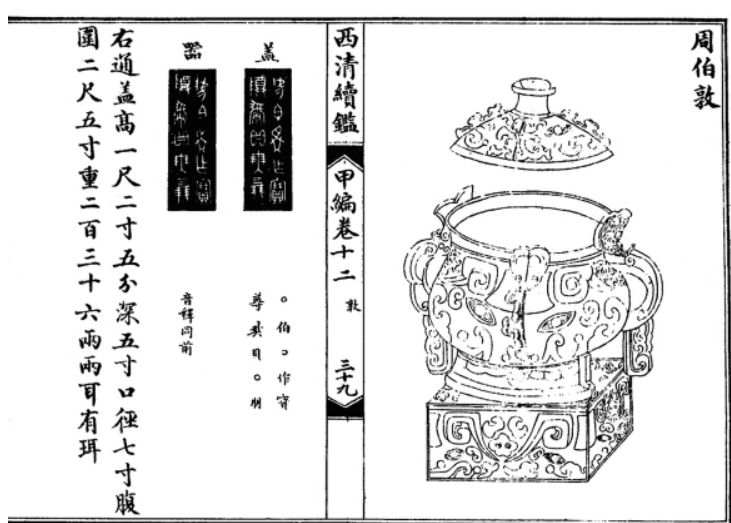
西克曼于 1947 年购入了一件器形纹饰特征属于西周早期的双耳方座簋(图二),簋腹内底有铭文



1



2



3

图三 纳尔逊-阿特金艺术博物馆藏陳伯鬯簋铭文及最早的著录

1. 铭文照片(据 Guolong Lai 2008) 2. 铭文拓片(《集成》3763) 3. 《西甲》卷十二·39

陳伯鬯簋最早著录于《西甲》卷十二·39,其后器、拓辗转,但通过铭文的比对,可以确定纳尔逊-阿特金艺术博物馆藏的神面纹簋就是《集成》3763 著录的陳伯鬯簋。





图四 Leon Black 藏神面纹簋  
(引自《保利藏金》第 355 页)

Leon Black 藏神面纹簋高 38.2 厘米，形制与陈伯爰簋器形一致，神面纹构图近似，年代也相同。该簋的双耳向外伸出较长，暗示其连接技术同样属于分铸铸接。

不过 Black 簋也有若千一些不同特点。在装饰上 Black 簋构图更加紧凑，并对眉、角等一些器官上的线图作锐折的处理，使纹饰的立体感得到加强。Black 簋方座上的神面纹方向与簋身一致，与陈伯爰簋方座上神面纹面对四角不同，相应地，Black 簋四角出扉棱，作为各组神面纹的边栏。Black 簋簋身神面纹鼻息处伸出钩云状扉棱，这种手法在羊子山神面纹青铜器上也可以见到。

铭韵误释为“敦”，这一桀误自吕大临《考古图》以来沿袭至清末，因此宋清的金石学著作中簋多名为敦。虽然如此，根据《西甲》著录铭文摹本和不甚形似的图像，我们仍然可以确定其为陈伯爰簋无疑(图三)。清宫旧藏伪器颇多，这一点在《西甲》等《乾隆四鉴》上反映尤为典型。但从王国维、容庚，

状况。我认为这是一件极其精美的珍品，依我浅见，这不大可能是一件复古之作，也不会是后人以古代风格仿造的赝品。”

显然，西克曼并没有说服陈梦家。在后者的著作《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中，并没有收录陈伯爰簋。不仅如此，这件簋也没有参加在美国主办的各类中国艺术品展览，甚至是纳尔逊-阿特金艺术博物馆本馆的展览，在博物馆自己编写图录时也将陈伯爰簋的年代定在宋朝。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经过对陈伯爰簋簋耳范土的热释光测年，证实其年代的确在西周范围。但是，热释光测年也未打消所有人的疑虑，陈伯爰簋在纳尔逊-阿特金艺术博物馆最近的扩建之前仍然一直未被公开展示。

陈伯爰簋在中国的境遇完全不同。此簋最早为清宫旧藏，著录于《西清续鉴甲编》(《西甲》)，器名“周伯敦”。之所以将器物称之为“敦”，是因为宋人将簋的自

到刘雨等整理《乾隆四鉴》的学者，均未有谓陈伯爰簋为伪者。陈伯爰簋流出清宫后，曾归入郭承勋、顾子嘉，铭文为多家著录，其中也录入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6.46.2)，这表明了清代学者对此簋的认



1



2

图五 神面纹卣

1. 保利卣 (引自《保利藏金》第 103 页)

2. 羊子山 M4 卣 (引自《随州出土文物精粹》图 32)

两件神面纹卣的铭文都省称器主，保利卣铭文为“作厥宝尊彝”，羊子山 M4 卣铭为“作宝彝”，这种铭文辞例常见于西周早中期。

在形制上，保利卣通高 33.8 厘米，羊子山 M4 卣通高 49.5 厘米。后者尺寸高大约三分之一，但在视觉效果上，并没有表现出相应的高大气势。如果不考虑体量而只是对比两卣的形制，保利卣甚至具有更为大气的特质。这种反差，与两器的设计相关。保利卣神面纹的布局充满器体，而且少见地将竖立的盖口与隆起的盖顶作舒缓的过渡，以便使神面纹能够覆盖整个器盖。这样，卣盖与腹部两处神面纹几乎满布于卣体，神面纹的表现力得以高度强调。相反，羊子山卣却具有该类豪华型铜器不应该有的疏简特点：神面纹幅面较小，且在器体中所占的比例不大，因此需要在卣体上下施加其他辅助纹饰以填补空隙，这使神面纹的主体地位受到局限。从造型看，羊子山神面纹卣较为瘦高，器表纹饰因之必须划分出较多的周数，纹饰单元相应地会比较细碎，这无疑削弱了器物的厚重感。

可。正因为如此,《殷周金文集成》及其后的修订增补本也都录入此簋(《集成》3763)。当然,他们并未了解到陈伯寰簋为纳尔逊-阿特金艺术博物馆所藏,也不知道此簋在该馆被定位为“伪器”的身份。各家相信陈伯寰簋无疑,其实只是相信其铭文无疑。在这一点上,大家和陈梦家的判断恰好是一致的。

无独有偶,另外一件为我们所熟知的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神面纹卣(图五,1)也有类似的神面纹装饰。虽然著录神面纹卣的《保利藏金》图录已经指出,该卣经过牛津鉴定中心的X光射线和金属成分分析,虽然有俞伟超、马承源、李学勤等先生专文论述,但考古学界不少同行仍然在私下里怀疑这件卣的真伪。

显然,是陈伯寰簋和保利卣独特的神面纹无法得到质疑者的认同。

## 二

神面纹青铜器顾名思义,是在青铜容器腹、盖的显要位置装饰构图如神面的纹饰。此类装饰的青铜器颇为罕见,过去只有寥寥几件传世品。除了前面说到的两件之外,美国纽约收藏家 Leon Black 也藏有一件神面纹簋(图四),簋的形制与纳尔逊-阿特金艺术博物馆陈伯寰簋近似:簋腹壁较直、簋身呈长方形、带珥的双兽形耳有发达的兽角上耸等等。显然,这两件簋的年代也是相同的。

来国龙讨论纳尔逊-阿特金艺术博物馆藏神面纹簋论文发表后几个月,就像是为了呼应他的意见一样,湖北省随州市博物馆公布了一批考古发掘所见的神面纹青铜器。《随州出土文物精粹》一书中,发表了三件神面纹青铜器图像,分别为提梁卣(图五,2)、方罍(图六)、觚形尊(图七,1)各一。这些青铜器出自随州安居羊子山的一座西周墓葬(编号M4),《随州出土文物精粹》发表羊子山M4的青铜器共有20件,分别为方鼎2、圆鼎1、觚1、簋3、爵3、斝1、觶

1、卣2、觚形尊2、方罍1、圆罍1、盘1、盃1,这些显示出墓主为高级贵族。M4青铜器时代风格一致,年代处在西周早期稍稍偏晚阶段。羊子山M4青铜器大多数铭文都有噩国标识,这其中的多数又为噩侯所作,如神面纹方罍铭文为“噩侯作厥宝尊彝”。羊子山过去也出土有西周墓葬和青铜器,其中1975年发现有“噩侯弟季作旅彝”尊。可见,此处墓地属于西周时期噩国的性质是十分明确的,而出土神面纹青铜器的M4,其铭文指代的器主身份也比较一致,墓主应该是一位西周早期的噩侯。

羊子山M4出土神面纹青铜器,是以考古发现坐实了神面纹青铜器的可靠性。换言之,羊子山M4青铜器证明神面纹在西周早期的存在。我们不难发现,考古和传世所见神面纹青铜器,不仅年代特征一致,神面纹本身的布局和构图特征,也几乎完全相同。与商周之际前后的兽面纹半浮雕凸起较为突兀不同,这些神面纹都是由鼻翼到面部圆润地隆起。神面纹眼睑的结构近似于人目,也与常见的兽面纹不同,因之给人以亲和之感而无兽面纹的威严与诡异。因此,以上所述考古与传世所见的6件神面纹铜器,装饰上都是在器物主体部位半浮雕地



图六 羊子山M4噩侯方罍  
(引自《随州出土文物精粹》图35)

羊子山M4出土的三件神面纹青铜器造型风格颇为一致,它们的形体均较瘦高,因此主体的神面纹幅面较小,在其上下往往加饰龙纹以免留空。扉棱和兽首的装饰也都很突出,除了在各组纹饰之间装饰夸张的扉棱之外,这几件青铜器在神面纹中轴处也设置扉棱,特别是在神面纹鼻端伸出勾云状扉棱,再在其上对应的位置设置兽首,这使浮雕的效果显得十分繁缛。

羊子山M4出土的三件神面纹青铜器的铭文各不相同。其中方罍铭文为“噩侯作厥宝尊彝”,卣铭为“作宝彝”,而尊未报道有铭文。铭文的这种差异又暗示这几件神面纹青铜器可能并非是一时间制作。





1



2

图七 神面纹尊和兽面纹尊

1. 羊子山 M4 神面纹尊 (引自《随州出土文物精粹》图 31)

2. 天理参考馆兽面纹尊 (引自《殷周の青铜器》图 21)

羊子山 M4 神面纹尊通高 34.5 厘米,天理参考馆兽面纹尊通高 39 厘米,两尊在器形上都是西周早期偏晚阶段尊那样的腹壁较直。两件尊在纹饰的布局都是三段式,上、下两周分别是蕉叶形兽面纹、双身共首的龙纹。两器的中段纹饰有所区别,天理参考馆尊是典型的兽面纹并伸出浮雕的兽角。从两件尊类似的纹饰,可以看出神面纹与兽面纹实际上并无本质的差别。

满幅塑出构图近似的人面,使被装饰的眼、鼻、角、耳等器官具象而更富有立体感。

我们知道,以妇好墓为代表的殷墟文化第二期青铜器的兽面纹,开始流行半浮雕与地纹结合的“三层花”,即地纹、浮雕、浮雕上的地纹三重纹饰。在此之后,商末至西周早期青铜器的装饰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几乎是两个极端的风格,一是以细密的云雷纹为基本单元构成带状的兽面纹。二是完全摒除地纹,以半浮雕手法突出表现兽面纹面部各器官,浮雕的边轮往往较为圆润而不似“三层花”兽面纹那样直折。这类无地纹兽面纹在殷墟时期数量不多,且只是较多地施于卣、觥、簋等圈足器。西周早期,无地纹兽面纹得到极大的发展,并与发达的扉棱结合,来表达器物厚重的风格。

神面纹正是形成于上述无地纹的装饰风格的背景之下,并进一步加强了装饰的立体效果:神面纹的器官浮雕凸起较多,乃至器内壁须作相应凹入的技术处理;神面纹青铜器在圈足等处的辅助

纹饰区,装饰半浮雕双身的龙而不是常见的较细碎的纹样;除了将器耳、提梁的顶端塑出圆雕的兽首,神面的正面也同样装饰圆雕的兽首;羊子山和保利两件卣提梁的转角、盖钮顶端甚至还加饰有兽首。这些装饰手段在其他类别的青铜器中都较少见<sup>①</sup>,从而使神面纹铜器充满豪华之感。

不难注意到,神面纹青铜器的豪华特质,是如羊子山 M4 墓主一样高等级和身份的一种表现。那么,如果说神面纹

青铜器折射出作器者高级别的社会层次,神面纹是否也是用以表达某种特定的高级别的社会含意?在《保利藏金》的青铜器专论中,几位著名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俞伟超先生认为神面纹就是人格化的“天帝”图像,其他想象动物图像则是“天帝”属下的神怪<sup>②</sup>。马承源先生秉承他的一贯认识“商和西周青铜器上的兽面纹,大都是神的图像”,神面纹也同样是人创造的神<sup>③</sup>。李学勤先生则只是审慎地提出纹饰属于“异形兽面纹”<sup>④</sup>。这些先生认识的一致之处,是都认为神面纹或兽面纹表达了古人神话世界中的某种意义,这也差不多是多数中国学者所持的看法。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古代青铜器上的想象动物纹样具有某种特殊含意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兽面纹等首先是一种构图或设计<sup>⑤</sup>。在我们看来,兽面纹的构图和兽面纹的含意应该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就我们所讨论的神面纹而言,其与兽面纹在设计上的关联是内在的。目前所见传世和出土青铜器的神面纹和兽面纹一样也都只是想象动物

纹样,其布局与兽面纹基本相同,都是属于表达兽面无躯的动物形象,兽面都是以鼻梁为中轴,对称展开嘴、目、眉、耳、角等面部部件。日本天理参考馆收藏的一件兽面纹尊<sup>⑩</sup>(图七,2),其造型、纹饰与羊子山 M4 出土的神面纹尊几乎相同。神面纹与兽面纹的区别,只是在具体部件的构图上,例如神面纹的鼻带有鼻息并舒缓地隆起,兽目也与现实生活中的动物更加接近。神面纹的角迤逦宛转,与一般兽面纹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从神面纹纹饰构图与兽面纹如出一辙来说,神面纹表达的意义——如果有的话——也当与兽面纹相同。

如果说神面纹只是表达类似兽面纹的含意,那它们在装饰上像兽面纹一样,既有相似性又有细节上的变化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羊子山 M4 青铜器与几件传世神面纹青铜器在形制风格上也有所不同。羊子山青铜器各组纹饰之间的钩云状扉棱更为夸张,并且在纹饰的中轴位置都伸出扉棱和兽首。在神面纹的结构上,羊子山青铜器也有所不同。例如羊子山青铜器神面纹的眉毛为带竖条的新月形,其他神面纹眉毛或简化或省略;羊子山铜器神面纹的耳作半浮雕的角状,其他神面纹的耳则采用了当时更加流行的“C”形。羊子山出土的几件神面纹铜器装饰和造型风格不同于其他神面纹铜器而又具有自身的高度一致性,暗示出羊子山青铜器独立生产的制作背景。

注释:

Guolong Lai, The Tale of Two Tureens: Connoisseurship, Taste and Authenticity, Orientations. Vol. 39 200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科学出版社,1962年。

Roger Ward and Patricia J.Fidler,eds, 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A Handbook of the Collection, p. 278, Hudson Hills Press, New Youk, 1993.不过,在该书的文字说明中,又将簋订在周代。这种情形也暗喻了陈伯衰簋年代在学者眼中的双重性。

刘雨:《乾隆四鉴综理表》,第47页,中华书局,1989年。

《保利藏金》编辑委员会:《保利藏金》,第103页,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

马承源:《关于神面纹卣》,《保利藏金》编辑委员会:《保利藏金》,第354~356页,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马承源先生文中谓此簋属于纽约的一个私人收藏。该簋又见于纽约的一个展览,参:Amy G. Poster, Crosscurrents: Masterpieces of East Asian Art from New York Private Collections, No. 18, pp. 86~87. Japan Society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Brookly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1999. 由此展览图录可知,簋的收藏者为 Leon Black,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展览中有他捐赠的晋式龙纹壶。

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2009年。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发现商周青铜器》,《考古》1984年第6期。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安居出土青铜器》,《文物》1982年第12期。

卣的例子如《全集》(第4卷),第154~157页。觶的例子如母乙觶、守父己觶、亚趾觶,分别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青铜器》图82,文物出版社,1985年。安阳市文物工作队等:《安阳殷墟青铜器》,彩图7,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⑬ 马承源:《关于神面纹卣》,《保利藏金》编辑委员会:《保利藏金》,第354~356页,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

⑭ 类似羊子山和保利卣提梁上加饰兽首的作法,还见于伯各卣等器(《全集》6.173),伯各诸器及宝鸡地区出土同类文化背景的青铜器,也都是装饰豪华,年代与神面纹诸器相同。

⑮ 俞伟超:《“神面卣”上的人格化“天帝”图像》,《保利藏金》编辑委员会:《保利藏金》,第349~352页,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

⑯ 李学勤:《异形兽面纹卣论析》,《保利藏金》编辑委员会:《保利藏金》,第358~360页,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

⑰ Robert Bagley, Meaning and Explanation. In Roderick Whitfield, ed.,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Early Chinese Ritual Bronzes, pp. 34~55. London, 1992.

⑱ 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参考馆:《殷周の青铜器》图21,天理大学出版部,1995年。

(责任编辑:周广明)